

# 回 归 无 路

——亨利·米勒及其《北回归线》

王 祖 友

**摘要:**当文明成为人的精神枷锁时,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在否定文明的过程中,建设起一种以性欲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反文明”,从而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关键词:**文明;否定;米勒;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36(2001)04-0036-04

和惠特曼、海明威这样的美国作家相比,亨利·米勒(1891 - 1980)在我国大多读者心中恐怕尚属“无名之辈”。然而,他却是当代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巨匠。T·S·艾略特把《北回归线》称为“一本十分卓越的书”,“在洞察力的深度上,当然也在实际创作上,都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好得多”。庞德认为《北回归线》“大概是一个人可以从中求得快感的唯一一本书”。美国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甚至说:“今日之美国大学以他(米勒)所做之事的意义而开始,也以此而告终结”。亨利·米勒自称是“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说他的书就是他所是的那个人,“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虑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这种自白与卢梭的《忏悔录》的坦白极为相似。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米勒除了无知便是误解。《北回归线》是他的第一部小说,1934 年问世巴黎,但直到 1961 年该书才获准在作家的祖国——美国发行,从此,亨利·米勒享誉本土。

《北回归线》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其代表作。该书书名颇有点怪异,它和书的内容相距甚远。原版(英文)的题目是 TROPIC OF CANCER 译成“北回归线”这个地理学名词当然正确,但要译成为“癌的热带”也未尝不可。作者在一篇散文中暗示 CANCER 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蟹是横行不羁,象征自由精神。另一方面,CANCER 是医学上的“癌”,是死亡的近邻,喻意西方文明的垂死。

《北回归线》是一本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它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生活在巴黎的青年艺术家的成

长经历,是一种探讨人生意义的实验小说,书中流露出激愤的情绪,也表现出狂欢的活力,既道出失败、耻辱,也尽显渴望、勇气。虽生犹死之苦和缘于文明的不能承受之重,都在小说中得到深刻的表现。

《北回归线》没有贯彻始终的情节,也不标明章节(分为十五部分)。书一开始提到作者住在波勒兹别墅,作者的朋友鲍里斯发现自己身上生了虱子,作者便“剃光他的腋毛”。接着作者评论道:“住在这样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要不是虱子,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此后,他又根据鲍里斯对天气的预测联想到“时光之癌正在吞噬我们”,点明书名另一含义——CANCER 作“癌”讲,暗示现代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如癌扩散。书中另一处说:“世界一个毒瘤,正在一口口地吞噬自己……”作者思维活跃,想象狂野,往往由一件小事引出许多跳跃式的、异乎寻常的联想,发出令人莫名其妙的怪诞夸张的议论。作者见到朋友莫尔多夫时,心里想:“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亚洲,我到那儿去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枝普普通通的手杖,在你身体一侧戮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变成一只筛子”。这是一幅全体的“自我”与群体的“文化”相遭遇的漫画。

这里作者暗示了现存人类文明束缚了人尤其是艺术家的本能,造成人性的共性和异化,是荒诞的人生羁绊,文明的酸液腐蚀了人的精神和肉体,自我成为“非我”。“莫尔多夫是文化的殉葬者,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米红、橘黄、淡紫、赫色、杏黄、天蓝、乌墨、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目冕色、铜绿色、奶酪色……”作者反对已成呆滞僵死文化的激情通过各种冷嘲热讽表现了出来,这种激情如此剧烈以至在书中另一处,他干脆断言:“饱学之士是人类的大敌”,米勒曾自称为“文化暴徒”。看来,这一称号当之无愧。他对工业文明——无论物质还是文化,都予以彻底的否定。在他看来“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割草机,更多的肥皂,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

米勒不厌其烦地写幻觉和梦想,现实与幻觉、梦境、虚构难解难分,给读者一种非理性的直观感、直觉感。例如:“这样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现实之中……他们就是除了呱呱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生动真实……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了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这里取消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也模糊了理想与现实的界线,幻境与实景相近到可以互换,对未来的悲观与对现实的绝望并无一致,虚构在此是真实的谎言,真实显得像虚构的故事,亦真亦幻,真到假时假亦真,假到真时真亦假。人类迷失在文明的迷宫里,现代文明悲剧在此犹如一幕闹剧。作者是让我们含泪而笑,还是欲笑还哭?然而,无论笑哭,我们都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一幅异化时代“非人化”的图像,不得不思索一下我们因麻木不仁而熟视无睹的问题。米勒做到了,这是他的创作的成功和对人类的贡献,如果他失败了,那是他的不幸,更是我们的不幸。

对于米勒,文明的毒品、机器、监牢、骗术、自杀、

梅毒、神经病……是人的精神枷锁,是人的“标准化”或“非人化”的罪魁祸首。在《北回归线》的开篇,作者明确表明这本书是要亵渎文明,“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一脚。”

米勒认为“如果生活意味着享受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最低的,尽管在美国比在世界其他国家生活需要更多的钱”。高度发达的机器文明允许人拥有豪华别墅,却无精神的“茅屋”、“文明人”能轻巧地弹奏肖邦、莫扎特,却无法轻松地面对工作、生活。米勒感到“我是一部写作机器,拧上最后一颗螺钉。机器便转动了,我与机器之间并无间隙”,“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到处都有“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的问题。

为了摆脱机器、摆脱社会、摆脱文明,亨利·米勒以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式的激烈口气,粗言秽语公开谈论人们避讳的东西,米勒表达的是一种精神反叛。“去它的!挽歌和哀乐。去它们的!传记、历史、图书馆和博物馆”,“我对自己说,我也爱流动的一切……甚至爱女人来月经时流出血,它冲走了生育能力不强的精子”。“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大海,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吧。让我们得到一个男男女女大脚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性、行动、戏剧、梦幻、疯狂的世界,一个孕生欣喜而不是不放屁的世界。”这种语调燃烧着自由、叛逆之火。卡尔·夏皮罗称米勒“是惠特曼在二十世纪的再生”。但米勒比惠特曼要求的“自由”更为宽泛,因为后者确信“恰如你们之中任何人都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个,我也曾是人群中的一个”“每个人都分崩离析了,但仍为组织的一部分。”如果说,惠特曼式的自由还是一种和谐中的自由,米勒的自由则是混乱的自由。米勒已远远走出了惠特曼所想象的自由天地的地平线之外。

对比一个米勒和劳伦斯,就会更清楚地显示出米勒自由反叛的程度。劳伦斯认为现代文明是人性完整的人,文明不应以扭曲无意识的本能和自然的欲望为代价,而人的本能和欲望是最基本要求,是对性爱的要求。他反对对性意识作任何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压抑,而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大恶果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从《白孔雀》中的阿纳贝尔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都贯穿了劳伦斯这样的创作主题:人挣扎于文明与自然之间,阿纳贝尔和梅勒斯都是超越了女人——文明

的化身——的男人,痛苦地保持着孤独,是自然与文明抗衡的第三种力量。但劳伦斯还有关于性爱的“彩虹”之梦:男女双方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炼狱体验而得以再生,取得如双星平衡般的理想的男女关系。如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剥蚀了厄秀拉母权的占有意识,而厄秀拉消除了伯金潜在的男性优越感,最终两人在肉体与精神的圆满中彼此认可了对方。伯金发现了人类的一批女儿,厄秀拉发现了创世纪的上帝的儿子,他们决定迅速地抛弃腐烂的社会,登上爱的方舟去创造新的人类,新的世界。这种夏日彩虹般和谐美丽的爱是劳伦斯的执着的梦。反映了他对生命永恒的信仰,对青春、爱情、活力、生机的无限信仰,对在艺术世界与现实这巨大鸿沟之上架设桥梁及在人与人之间开通心灵的沟通的信道还抱有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相比之下,米勒及其伙伴对性爱的对象,却是只有占有、征服甚至摧毁的烈火中烧的欲望。其作品中的人物动物似的对待性的方式,留给女人的感觉是“到处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过后又是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这里有一种不顾人命的漫不经心,找个性爱对象就象找个容器来倾泻多余的液体:一种恨不得“在世界的屁眼里放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强烈破坏欲。对于米勒小说中出格的性描写,我们不应简单斥之为“低级”、“庸俗”或“色情”,而应看作是作者寻找自我,回归自然、重建自我的一种努力。实际上,性爱是米勒及其伙伴对抗无孔不入的癌一般扩散的机器文明的绝无仅有的方式。

如果说劳伦斯的性爱是以人性为基础的,笼罩一种和风细雨的温情,米勒的性则是兽性的,是一种欲望发作的狂风暴雨。劳伦斯渴望“好雨知时节”的性来装修“花重锦官城”的爱,米勒则执意要让性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以冲出一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然而,米勒从来也没有展示出一个干净清凉的世界,是不能,还是不愿呢?我们难下定论,米勒有一件轶事倒是耐人寻味。

米勒五十年代定居加州的大色尔区,对新一代叛逆者“垮掉派”,他成了一位重要的精神顾问。诗人卡尔·夏皮罗标榜自己为“米勒分子”,他在1959年写到:“所有性别的人经常出现在大色尔。他们宣称他们要加入米勒的性崇拜,亨利给他们付车费加上一顿美餐,然后送他们上路。”看来,即使“米勒分子”也难全面把握被他们称为“圣人”、“教主”的米

勒的微言大义。

作一点米勒“简历”的回顾,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其思想精华的理解。

米勒于1891年12月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之家,1909年入学纽约市立学院,两个月之后即放弃学业,开始以各种手段谋生,丰富的生活给他提供了广泛的创作素材。血统的关系在他的哲理思考上烙下德国思想家的印记。后来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尼采的“成为你自己”的呐喊,在米勒心灵上回音不断,在《黑色的春天》中,他写到:“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施本格勒的西方文化没落论加深了米勒在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的感受,在反传统方面,米勒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和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有许多共同点。兰波试图去掉单调的公认含义和逻辑内容,他要摆脱任何束缚,要成为“永恒”的代言人,要创造新语言形式表现诗的意境魅力,布勒东鼓吹“自由即人的本色”,他倾向无政府主义,怀疑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理想和文化道德,认为理性以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毒害。为改变世界和人性,他强调艺术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之间界限,进行自动创作“一种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这就是一种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排除一切美学的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的自动记录。”米勒推崇的英美作家多为富于叛逆、创新精神的艺术世匠,他继承这种精神并发扬光大。

米勒思想很复杂,这与他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很有关系。在三十三岁辞去工作从事创作前,他就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尼采、兰波、老子等名家的作品,对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的绘画,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古犹太苦修派的教义,神秘学,星相学等也有相当的了解。他兼收并蓄,却不盲从,他是自己创作的主人,也是自己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预言家,一种新意识的创始人,一个神话——自由对人类之吸引的——神话的创造者。

无论在写作风格还是思想倾向上,米勒均有独到之处。他再现了惠特曼的民主思想;他发扬了劳伦斯超力量的“血性意识”,但他的民主自由意识又远远超越了前辈,他的生命本能的张扬犹如势不可挡的洪水猛兽冲破一切社会约束。他的文体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尽管那种“不择地而出”的万斛泉涌的文体在杰克·凯鲁亚克、约瑟夫·海勒、诺

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当代小说大家的作品中得到相当成熟的再现,但这些后来者无一达到他那独步巅峰的犀利和震撼人心。

米勒承认“我搞写作是出于被迫,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途径,唯一力所能及的任务,我曾真诚地尝试过其他通往自由的道路,但都未成功”。他不把自己看成作家,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在不断讲述自己经历,最后发现所讲述的东西远不如讲述本身那么重要。对于他,“创作就是生活,写出来的便是死亡”。小说只是生命的组成形式,与生命本身一样。创作是一个充满发现的冒险过程,对这种冒险我们应作象征意义上的理解。作家生活在上下两个世界之间,作家选择创作以还给我们一个到处生机盎然的歌唱的宇宙,并最终与之融为一体,过一种与宇宙中心深处的旋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正因为艺术超越时空,指涉整个宇宙的过程,显现隐蔽的生活本质,它才有意义、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家一直是逆时势而动的。艺术家一直是非历史现象。对艺术家来讲只存在现在,永恒的此时此刻,既然作品犹如生命,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那就可以无开头,无结尾。米勒的创作就是直觉的自动创作。他只信正在进行的写作,作为作者的自我,编造、歪曲、变形、扯谎夸大、混淆,不一而足,随心所欲,不顾及道德观念,也不屑顾理想主义,一切都忠于要求变化的“自我”,创作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追求,“自我”的存在,“自我”的意义。如果把惠特曼的诗看作一种分行排列的散文,米勒的小说就是分章排列的散文,两者都有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妙处,他们都是一曲 Song of Myself (自我之歌),米勒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sup>⑪</sup>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小说,但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他不是为简单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文化,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

至此,笔者似乎还是在旁敲侧击,这里除了论述程式的拮据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亨利·米勒的精神核心的难于揣度,这使概述或提要成为难事。

如上所述,米勒的思想、创作渗透了反传统、反文明、反道德、反社会、反历史的狂躁。即使以西方文化标准来衡量,他的伦理观、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割裂个人与社会、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以人的动物性对抗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倾向,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在否定文明、否定“中心”的过程中,米勒建设起一种“以性欲为基础,自我为中心”的反文明,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以性文化对抗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性关系上的伪装,通过性的自由冒险和自动抒写达到一种极高的自由境界,从回归到“自我”。然而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率性随意、赤裸粗俗的性描写不仅削弱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影响了其艺术魅力,的确有损作品的价值。米勒被称为“淫秽语言之王”,他应该承认这是名符其实的。

但是,作为小说家的米勒却是伟大的。他的伟大独创之处在于他的作品能诱发出一种能量,使人惊醒、警醒、觉醒,而不在昏睡、沉醉、麻木。正如米勒的知音阿那依斯·宁所言“他的书予以我们的正是血和肉”。犹如清风吹倒了枯树,他的书“触到了这些树根”,以后继续向下拉,去挖掘地下道道清泉”。<sup>⑫</sup>也许在米勒看来,这正是回归之路的开始。

#### 注释

- 、 、《亨利·米勒全集》之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2页。
  - 、 、<sup>⑫</sup>《亨利·米勒全集》之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12页、第6页、第23页、第34页。
  -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第16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236页。
  - 、《美国文学掠影》,彼得·B·海著,胡江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40页、第141页。
  - 《亨利·米勒全集》之八,《巨大的子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25页。
  - <sup>⑪</sup>《亨利·米勒全集》之二,《南回归线》,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2页。
- 其它译自 Henry Miller 's Tropic of Cancer, (Yilin Press, 1997)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传禧)